

女人的飞翔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透视]

◎ 蒋晓丽/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女人的飞翔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透视]

◎ 蒋晓丽/著



大家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飞翔/蒋晓丽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5

ISBN 7-80171-795-3

I. 女...

II. 蒋...

III. 妇女文学—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928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171-795-3/I·473

定价:23.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作者简介

蒋晓丽 1959年生，湖南永州人，毕业于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为湖南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2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广宽背景下的定点探索

(序 言)

蒋晓丽女士多年来致力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研究，神情专注，目标如一，一直在进行锲而不舍的定点探索，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有成就，这部《女人的飞翔——20 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女性文学透视》就是她近年来的心血和成果的结晶。蒋晓丽女士的研究虽然是定点探索，但她并不就事论事，并没有把眼界局限于研究对象自身，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经济、社会、文化这种广阔的背景下来观照、考察，这样她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显得视野开阔，高屋建瓴。

在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的，而“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和明确则是 90 年代的事。那么，女性文学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末产生和发展呢？蒋晓丽女士对此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她对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时代背景作出了深入的探索，她在《导论》中细致地分析了其三方面原因：其一，经济、文化转型的多元化时代为女性文学提供了多元的生长空间。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的作用下，女作家们获得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进艺术世界的机会与可能。

其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本土的“新女性”文化与文学为女性文学贡献了思想理论资源。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传播，不断给女作家们以理论与创作的启迪，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崛起的深度理论根源；而五四以来的“新女性”文化和文学则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资源。其三，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成熟，为女性文学兴起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这是女性文学崛起的内因。蒋晓丽女士的上述分析是准确而深刻的，女性文学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只有将新时期女性文学还原于社会之中，放置于20世纪末这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才可能较深入地认识其根源、特征和内在规律；或者说，我们可以透过女性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去认识和理解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和某方面的特征。

在对20世纪末女性文学崛起的原因作出上述共时性分析的同时，蒋晓丽女士还对其发展流程作出了历时性的考察。她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70年代末期前奏过后的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80年代初张洁的小说《方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80年代中、后期为第二阶段，即女性话语摸索建构阶段，残雪、翟永明、王安忆等是这一阶段写作的重要代表；90年代为女性文学的第三阶段，是真正个人化的女性话语阶段，也是女性文学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女性立场的讲述成了一批女作家共同的写作姿态，甚至造就了自己的批评家。蒋晓丽女士的上述阶段划分显然是粗略的、大致的，但却是从基本和主体的事实出发的，应该说是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得出的概括和结论。

在时20世纪末期女性文学作出了上述宏观审视和整体考察

后，蒋晓丽女士在对一个个具体的女性文学作家进行解读和剖析时，能较好地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揭示出其内在的本质特征。蒋晓丽女士将20世纪末期的众多女性文学作家总结、概括为四种基本的类型，即本书的第一至第四章。第一种基本类型是“女性独特的‘个人化写作’”，或者说是“女人被遮蔽的身体、欲望的精彩描述”，主要包括了林白、陈染、徐小斌等作家。第二种基本类型是“女性生命史的重新叙述”，即通过对女性血缘关系的重新清理，摇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神话链条，主要包括了铁凝、张洁等作家。第三种基本类型是“城市女性风景的描绘”，即表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困惑的女人”，主要包括王安忆、张欣、徐坤、张抗抗、张梅、方方、池莉、朱文颖等作家。第四种基本类型是“乡村女性风貌的展示”，即表现了“原始的乡村与质朴的女人”，主要包括迟子建、蒋韵等作家。理论的概括虽然有利于凸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却容易忽略个别与细部，这说明理论概括总是有其局限性的。蒋晓丽女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没有简单地对所有女性文学作家都去作削足适履的归类，她在概括出上述四种基本类型后，又另列两章（即第五、第六章）去解读毕淑敏和残雪，她用“地母般的女人之爱”去概括毕淑敏，用“梦幻荒诞的小说世界”去概括残雪。接下去还有一章论述“九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这是对大陆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补充。最后一章（第八章）“女性的言说”，是在第一至第七章偏重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提升。

蒋晓丽作为一位研究女性文学的女性研究者，保有理性的冷静态度和学术中立的立场，她在对女性文学作价值判断时能努力做到好处说好、坏处坏说。比如她在第一章中就直率地指出：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被欲望遮蔽的女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本能的遮恋和失控。这些女作家们对性和性描写有了自己的尺度——从女性被动的付出性，到主动地将性用在男人的身上。但，性的美感在她们的描述中消失了不少。我以为，做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乃至做其他学术研究，都应该采取这种学术中立的立场。

今年一月初，我随同我校的若干同事到浙江的浙江理工大学、湖州师范学院等几所知名高校考察，在出发来杭州的列车上我开始阅读蒋晓丽女士的这部书稿，考察期间，晚上继续在宾馆的房间阅读。读这部书稿，不仅给我不少理性的启迪，而且给我带来了许多的阅读快感，让我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我虽是在旅途的宾馆里，匆匆但却是认真地写下了上述的读后文字。

余三定

2006年1月18日深夜于湖州宾馆

目 录

序 言 广宽背景下的定点探索	(1)
导 论 女性文学的演进轨迹及亮丽风采	(1)
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缘起及其演进轨迹	(1)
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亮丽风采	(8)
第一章 女性独特的“个人化写作”	(15)
第一节 林白——绚丽多姿的女性欲望	(35)
第二节 陈染——迷乱清幽的私人生活	(45)
第三节 徐小斌——姹紫嫣红的“迷幻花园”	(56)
第四节 逃离——女性欲望的孤独之旅	(62)
第二章 女性生命史的重新叙述	(67)
第一节 铁凝——通向母亲之路的《玫瑰门》	(69)
第二节 张洁的“母性女儿”	(74)
第三节 “纪实与虚构”的母性史	(79)
第四节 母性姐妹	(82)
第五节 女性创造新生命的礼赞	(86)

第三章 繁华的城市与困惑的女人	(93)
第一节 王安忆——城市女人与物质的关系	(94)
第二节 张欣——城市丽人的情感世界	(111)
第三节 徐坤——城市知识女性的两难处境	(128)
第四节 张抗抗——女性意识从“潜抑”到“张扬” ...	(141)
第五节 张梅——“破碎的激情”	(169)
第六节 方方、池莉的“市民小说”	(176)
第七节 朱文颖——温和明亮优雅的城市女人	(191)
第四章 原始的乡村与质朴的女人	(197)
第一节 迟子建——“灵魂的还乡”	(197)
第二节 蒋韵——“古老的美丽”	(215)
第五章 毕淑敏——地母般的女人之爱	(221)
第六章 残雪——梦幻荒诞的小说世界	(249)
第七章 九十年代台湾的女性小说	(263)
第八章 女性的言说	(287)
结 语 女性文学的展望	(293)
后 记	(307)

导 论

女性文学的演进轨迹及亮丽风采

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缘起及其演进轨迹

严格地说，中国大陆女性文学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女性文学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到逐渐为学界认可和接受，则是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并不是说被西蒙·波伏娃称之为“第二性”的中国女性此前没有从事文学活动，而是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其写作一方面遭致男权专制文化的忽略、贬低和抹杀，声音近乎消失；另一方面也难以挣脱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网络和美学成规的铁篱，而往往成为花木兰式的“仿写”。所以，千百年来，女性写作无法以清晰的面貌凸现于历史地表。20 世纪末东方女性特有的文化际遇，使女性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得以浮现和命名，就此打破了男权文学的一统天下，宣告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正式诞生。

女性文学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崛起有着多重的背景和原因。

其一，经济、文化转型的多元化时代为女性文学提供了多元的生长空间。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打破了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促成了文学中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三足鼎立、“共享空间”的确认。女作家们

获得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多元话语空间的恩惠，女作家们感触良深。1994年，林白的叙写女性躯体、女性欲望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面世后，引起了大陆文坛一场辩论与动荡。作者本人遭受过种种非议和诘难。书的出版发行也历经挫折与艰难。但作者及作品，毕竟没有像以往那样，招致主流话语的封杀。历经一年多的辩论之后，即使在多数权威男性批评家那里，林白以及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都已成为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女性主义范本，无怪乎林白不无感激地表示：“只有90年代的多元化，才会有我的生长空间。”^①

其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本土的“新女性”文化与文学为女性文学贡献了思想理论资源。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传播意义重大，功不可没。它不断给女作家以理论与创作的启迪，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崛起的深度理论根源。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现象、新思潮，通过译介引进中国，并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1981年，朱虹在为《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所写的序中率先介绍了美国妇女现状及女性主义思潮。1983年，她在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的前言中全面介绍了西方妇女文学及美国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研究现状，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等早期的女性主义经典。这些简略的介绍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一向耳目闭塞的中国读者见识了女性主义理论这朵异域奇葩。80年代中期以后，译介出现高潮。先是《外国文学》、《上海文论》开辟专

^① 张永恒：“‘女性主义’文学再度引起争议”，《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日。

栏重点评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创作。而后,《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批评》等权威性刊物及普通刊物纷纷推出此方面论文。接下来,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格里尔的《女太监》等专著;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论文集,先后由国内各家出版社出版;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塞斯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阿赫玛托娃等欧美女作家的创作也纷纷在中国面世。大量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译介,不仅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创作参照,而且营造出一种呼唤女性文学勃兴的氛围。90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的理论导引下兴起的女性躯体写作热潮,可看作以上阐释的形象说明。

另一方面,世纪之初,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女性”文化和文学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资源。20世纪伊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先驱的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以一首《勉女权歌》表达了广大受压迫妇女争自由、求解放的共同心声。并且以身示范,为妇女做出了实际斗争的榜样。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雷,惊醒了睡梦中的现代知识女性。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凌叔华、白薇等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女作家,纷纷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手中之笔书写着女性解放的进行曲。这其中既有母爱亲情的赞美、平等性爱的呼唤,又有对父权专制的愤懑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这些透露着女性意识的写作母题,历经七八十年的历史轮回延续至今且常写不衰,成为启发一代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宝贵文化资源。

其三,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成熟,为女性文学兴起准备

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我国女作家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是伴随着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而来的，表达的是与被压迫阶级男子同样的反叛封建伦理道德、反抗阶级压迫、追求人的权利的相同要求。这种反叛和觉醒的方式与西方妇女孤军作战、因各种社会压力而发生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有着极大的区别，它没有脱尽男性的印迹，不具备女性性别的独立意义。因此，女性的创作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对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男性作家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模仿，其书写的主题，如性爱自由的追求、“娜拉出走”后的困惑和困境等，与男性文学所写并无根本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的女作家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种大而化之的男女平等，主要不是女性独力奋争、意识觉醒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赐予的。它一方面是对几千年的性别歧视史的一次深刻的颠覆和改写，但另一方面又否认了女性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性别特点的存在群体的必要。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刘慧英所言：“1949年以后我国始终在政治和经济上保障妇女的权益，给全体人民灌输‘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同样也不标志着妇女的自我觉醒和整个社会意识的提高已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种表面的权益和地位的可靠保障中非但男性意识和观念没有杜绝，妇女的自我意识也趋于涣散和退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目前西方所面临的困惑。”^① 作为作家也同样如此。“十七年”文学中女

^①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第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性书写中反复出现的泯灭性别的“女英雄模式”，可说是女作家性别意识退化的明显例证。有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或集体的斗争……可以说，‘十七年’的新女性的‘新’就在于妇女必须像男性一样在公众生活中找到作为劳动者的自我实现的位置，她们走出家门之后，已不再如‘莎菲’们那样茫然和孤独，献身于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在等着她们。”^① 写作女性及其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就这样淹没于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主流话语之中。

直至新时期，国家政治的转机使新一轮女性精神解放获得了契机。在人的解放思想启蒙下，女性几近泯灭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不少女作家在文本中表现出对男权文化观念的强烈反抗和女性独立人格的积极追求，并以爱情为重要主题，代表当代女性发出了对情爱文明的女性特质的呼唤。她们明确表示：女人，不是月亮，不要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女性的解放不能依靠别人的恩赐，要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去争取，而这种解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地位的获得，还包括女性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这些满怀激情的表达昭示着女作家女性意识的成熟和自觉，这种具有清醒、自觉女性意识和良好文学素养的创作主体，无疑是女性文学崛起兴盛的至关重要的内因。

上述三方面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女性文学终于成功地破土而出，并迅速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道光彩独异的亮丽风景。

^①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82-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尔沃特根据文学亚文化的共性，将妇女创作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女人气阶段，指 1840 ~ 1880 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乔治·艾略特等人的创作。这是一个较长期的摹仿主导传统，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权主义阶段，指 1880 ~ 1920 年伊丽莎白·罗宾斯和奥丽夫·史克林娜等作家的写作。这是一个反对主导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第三阶段是女性主义阶段，指 1920 年以后的妇女写作。这是一个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演进替伊莱恩·肖尔沃特女士的分析补充了一个新的例证，不过这一例证显现了某些中国特色，即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显现出后两个阶段的并行不悖。从较大历史范围看，我们可以将整个古典时期（至五四以前）视为摹仿主导传统的时期，而将此后直到今天这段历史视为有起伏和逐渐深化的反对过程。这一“反对过程”又包括五四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萌芽和预演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年间的蛰伏期，“文革”十年的间断期和新时期以来的复苏、发展与成熟期。具体就我们界定的女性文学而言，它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有必要提到 70 年代末的女性写作，它作为女性文学凸现的前奏仍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之所以将之命名为前奏，主要因为那时的女性写作有女性风格，却没有明确的女性意识。即使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这样不同程度地描写到两性关系的作品，表达的也只是人的解放潮流中包含的对女性尊严及其情感的呼唤，前者既遮蔽了它，同时又兼容了它。这种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只能算

是“伤痕文学”的组成部分。

80年代初，张洁的小说《方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标志着女性文学发展进入第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女性意识形成、女性价值发现的时期，带有自发的、本能的、抗议性特征。《方舟》通过一个“寡妇俱乐部”里三个女主角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长期被男权社会遮蔽的事实：“做一个女人，真难！”不过，这篇小说的女性意识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本能的、生命的，它的社会指涉和理想主义的感伤，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自觉女性立场的观照，但值得肯定的是，张洁们毕竟已发出了“为了女人，干杯！”的呼喊。这种女性意识的形成，女性写作的自觉，已驱使写作女性游离宏大叙事的男性话语场地。

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向前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女性话语摸索建构阶段，残雪、翟永明、王安忆是这一阶段写作的重要代表。残雪的小说一反男性写作的线性历史时间，深入梦幻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从《山上的小屋》到《黄泥街》，一方面展现出“被男性的宇宙所包围”（西蒙·波伏娃语）的女性世界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又以充分的个人化、心灵化的反男化叙事及其话语方式解构了依附于父权制巨型话语之下的温情脉脉的女性叙事，开拓了女性话语的新角度。翟永明的诗歌则从女性躯体提取女性话语。她的组诗《女人》、《静安庄》、《死亡的图案》等均围绕女性身体的生命阶段展开，通过身体的发育、变化，回应与阐述外部世界，对东方男权神话进行解构。翟永明们创造了一个敞开女性躯体和灵魂的“黑夜”世界，充满女性独特感觉与幻觉的意象，带着神话原形和寓言的气息，在黑暗的闪光中舞蹈。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压缩的形式